

祝堯《古賦辯體》的賦論（上）

鄧國光
澳門大學
教育系

〔內容提要〕：辭賦衍至宋、元，體格大備，而傳世作品交沓，蕪莠雜陳，整理與總結，時機已至。元代延祐初年復舉業，試士以古賦，辨賦體格已為時代的必須。祝堯編纂的《古賦辯體》十卷便是因應時代的要求的辭賦總集。是集選載戰國以迄宋末六十一家凡一二九篇作品，以時序排次，於正集八卷類區為楚辭體、兩漢體、三國六朝體、唐體和宋體，於外錄二卷別選五類賦體的變格；每一體類、作品以及作者，祝堯都表示了批評的意見。這種總集和批評結合的模式，遠紹西晉摯虞《文章流別集》，近則取法晁、朱的楚辭學，啟導明清兩代賦論以及辨體批評。祝堯賦論就辨體批評、賦本確立，古體回歸及六義釐析四方面，倡導以抒述怨思的小賦為古賦的大體。以發展及辯證的意識總結辭賦的演變，而且自具嚴整的理論架構，實唐宋以後文論的奇葩。

前言

賦論伴隨著辭賦的發展而出現，構成賦學的重要部份。《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了楚漢以來辭賦凡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綜歸四大類屬，有條不紊，一方面體現了辭賦發展初期的盛況，而這種宏觀式的大規模整理工夫，對推動賦論的發展起重要作用。魏、晉以後，隨著目錄學的發達以及文集體裁的誕生，產生了如摯虞《文章流別集》這類史、論、評結合的文章總集，繼《漢志》之後又一次大規模的辭賦的整理，總結了漢、晉以來的賦論。至南朝，總集與評論分道揚鑣，選文的

《昭明文選》，衡文的《文心雕龍》，各自發展《文章流別集》一體。唐、宋兩代的辭賦評論比較薄弱，賦學著述集中於律賦的範疇，不外是帖帖津梁而已。及元祝堯編纂《古賦辯體》十卷，雖惟辭賦是選，但史、論、評相結合，迴溯《文章流別集》的端緒，對屈、荀以迄唐、宋以來的辭賦發展予全面的總結，深得紀昀《四庫提要》的許可【註一】，中國古代賦論的規模於焉確立，而明、清兩代賦論莫不受祝書的沾潤；至於祝堯辨體的批評、賦本的確立、古體的回歸以及六義的釐辨，乃構成一自足而嚴密的理論架構和衡文的標準，不只於賦學史上，即使置於唐、宋以來的文論史長河裡，也是罕見的。但自近代以來，《古賦辯體》長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火焰不顯，無論就賦論、文體論以及文論史的研究說，都不免是一種遺憾。本文的提出，勾勒祝堯賦論的概略，以供學界參考；淺學仄聞，疏陋必夥，苟能匡我不逮，何其幸焉。

(一) 祝堯生平行誼

祝堯行誼，不載於正史，惟方志尚存概略。《江西通志》卷廿四「選舉表」於延祐五年（公元一三一八年）霍希賢鄉試榜下注祝堯謂：「上饒人，無錫州同知。」【註二】《無錫金匱縣志》卷十五「職官表」載祝堯謂：「上饒人，字君澤，延祐五年進士。年次未詳。」【註三】江西《廣信府志》卷九「人物·宦業」錄其人事蹟較為詳細：

祝堯，字君澤，上饒人；博學能文，所著有《大易演義》、《四書明辨》、《策學提綱》、《古賦辯體》。延知（案：應作祐）進士，授南城丞，改江山令，陞萍鄉州同（案：應作同知）。存心撫字，獄清訟革，吏畏民懷。【註四】

上饒於元入信州路治，明代則改隸於廣信府。方志的記載，無不強調祝堯「延祐五年進士」。緣於蒙元之廢科舉，至元仁宗二年始復選士【註五】；祝堯為元代初期科舉進士，自然為人注視。但礙於元代極端歧視漢族的統治政策，身為南人的祝堯實在很難透過科第晉身的；雖然僅得授任地方官職，不得大用於世，惟任內頗見政績，亦屬非常之士。

祝堯的四部著述，《廣信府志》卷十一「藝文·經籍」冠置卷首【註六】，顯然頗受鄉黨推重。今惟《古賦辯體》傳世。若從書名推斷，《四書明辨》、《古賦辯體》、《策學提綱》三書和元代的科舉有一定的關係。《元史·選舉志》載延祐科試內容，漢人南人所參與的三場，第一場用朱注《四書》命題，第二場試賦和詔誥，第三場試策【註七】。祝堯著述對象都與

此相應，顯為應世之作。《宋元學案》沒有纂錄祝堯的學術言論，但江西祝氏於宋、元以傳《易》著稱【註八】；家鄉所在，「歷代以來，理學輩出」【註九】，加上《古賦辯體》多稱引朱熹說法，綜合種種現象，推斷其人為服膺程、朱的學者，雖不中亦不遠。祝堯在《古賦辯體》中說到「去古日遠，人情為利欲所汨，而失其天理之本然」【註十】，儼然一派理學家的口吻了。元代科場尊朱子學，祝堯的學術大抵和時代學風配應。

(二) 《古賦辯體》的編纂

甲、編纂的旨趣

唐、宋以律賦試士，有所謂「進士賦」，風會所及，遂蔚為大宗，祝堯謂「嘗觀唐人文集及《文苑英華》所載唐賦，無慮以千計，大抵律多而古少」【註十一】，古賦問津乏人，誠以「上之人選進士以律賦，誘之以利祿」【註十二】。元室於延祐年間復行科舉，以「古賦」取士，於是「昔者無用，今則有用矣」【註十三】；而元人賦學著述，亦群趨於「古賦」一途。賦體之變，由上而下，關鍵於科第所尚；至於賦論軌轍，亦因之而變。平庸輩循跡委蛇；於時會之間別開生面，不落窠臼，則必待高明。祝堯之纂《古賦辯體》，別存深意於時趨之間。為釋其旨，先宏觀蒙元一代的賦學論著情況。據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載，名目如下：

吳萊《楚漢正聲》二卷（集宋玉、司馬相如、楊雄、柳宗元四家賦。）

郝經《皇朝古賦》一卷。

虞廷碩《古賦準繩》十卷。

祝堯《古賦辯體》八卷，外集二卷。【註十四】

此外，《千頃堂書目》尚有兩種為錢志所漏的，目如下：

佚名《古賦青雲梯》三卷。

祝堯《古賦辯體》的賦論（上）

佚名《古賦題》十卷，後集六卷。【註十五】

就名目看，可謂林林總總，有作品的結集如《楚漢正聲》和《皇朝古賦》，供士子揣摩；有指導寫作的，如《古賦準繩》、《古賦題》之類，屬考試指南；至於《古賦青雲梯》立名不避庸俗，大抵是書賈招徠之術。從延祐二年至元亡的五十一年間，見於著錄的古賦論著即有六種之多，其他坊間刊本，相信為數不少。不過，芸芸之中，除了祝書外，大都亡佚了。雖然說作品的傳世有幸有不幸，但本身的價值還是主導的因素。《古賦辯體》之所以深受明、清兩代學者推重，自必具備超越一時需要的學術價值，否則，亦難逃同時代其他古賦著作淪佚的命運。

辭賦雖然有長遠的歷史，但專門的賦學著作至唐、宋始出現，《宋史·藝文志》著錄的有：

白行簡《賦要》一卷。

范傳正《賦訣》一卷。

浩虛舟《賦門》一卷。

紇干俞《賦格》一卷。

和凝《賦格》一卷。

毛友《左傳類對賦》六卷。

張仲素《賦樞》一卷。

馬偁《賦門魚鱗》十五卷。

吳處厚《賦評》一卷。【註十六】

這些著述都已失傳，從書名及卷數推測，大抵不出科場律賦的寫作指導。卷數最多的《賦門魚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編集唐蔣防以上至本朝宋祁諸家律賦格訣。」【註十七】，屬於律賦格訣的總匯。這都是針對科舉的需要而出現的著述，談不上辭賦的全面討論；祝堯於《古賦辯體》中論兩宋賦學說：

渡江前後，人能壟斷聲律，盛行「賦格」、「賦範」、「賦選粹」，辯論體格，其書甚衆。至於古賦之學，既非上所

好，又非下所習，人鮮為之；就使或為，多出於閒居暇日以翰墨娛戲者；或惡近律之俳。二體衰雜，迄無定向，人亦不復致辨。近年選場，以古賦取士，昔者無用，今則有用矣。嘗考春秋之時，視國盛衰，別人賢否，每於公卿大夫士所賦知之。愚不知今之賦者，其將承累代之積弊，嘍嘍咿嚶，而使天醜其行邪？抑侈太平之極觀，和其聲而鳴國家之盛邪？則是賦也，非特足以見能者之材知，而亦有關吾國之輕重，學者可不自勉！【註十八】

這種語重心長的忠告絕非無的放矢。兩宋賦學只辯律賦體格，偏而不全，古賦之學衰絕！體要莫達，雖有心寫作古賦，特意拒斥俳律，惟矯枉過正，遊移於「文體」間而致「以文為賦」，無涉於古體。元室取士以古賦，但古賦之體舉世莫辨，作者以意為之，非驢非馬，但淪為「嘍嘍咿嚶」的嘈音雜響而已。明人吳訥《文章辨體》便批評元代辭賦說：

元主中國百年，國初文學不過循習金源之故步；迨至元混一，士習不變，於是完顏之粗獷既除，而宋末萎茶之氣亦去矣。延祐設科，以古賦命題，律賦之體由是而變，然多浮靡華巧抑揚歸美，至末年而格調益弱矣。【註十九】

可見元代所謂「古賦」，體尚浮華而甚至於萎弱無骨，有名無實。這種情況，正是祝堯所深致不滿的。為了矯正時弊，明確古體特質所在，乃是至重要的一步。祝堯於目錄序述著書旨趣說：

古今之賦甚多，愚於此編，非敢有所去取而妄謂賦之可取者止於此也，不過載常所誦者爾。其意實欲因時代之高下而論其述作之不同，因體製之沿革而要其指歸之當一，庶幾可以由今之體以復古之體云。【註二十】

清楚認識上的障礙，辨別辭賦創作應循的方向，了解古今體制源流變化，則復歸古體，方才名實相副。祝堯之編纂是書，實有感於元代古賦創作路向的迷惘，乃試圖抉示「大體」所在，俾世之習古賦者得所依循。至於判別源流，剖陳優劣，信而有徵，自非當時惟以帖帖是務的賦學論著所能比擬。

乙、結構與選文標準


《古賦辯體》旨在辨古賦大體，確定寫作的方向，選文無非為體現這撰作的精神。全書共十卷，兩部份構成。前八卷正錄編選屈、宋以迄洪舜俞等凡三十五人的作品共七十篇【註二十一】，依時序次，類分為楚辭體、兩漢體、三國六朝體、唐

體、宋體；每一體都繫以序論剖析一代作品的總體創作特色，宏觀賦體的流變。入選的作家和作品均附解題，討論優劣，沿用朱熹《楚辭集注》以「六義」解說的途徑，說明作法，屬於具體而細緻的文學批評。全書的編次都是經過悉心的安排，這樣有系統的賦學專著，在中國古代可謂絕無僅有。為了徹底認識這部書的價值，先從選文說起，下表列出前八卷的著錄情況。

體	作者	作品	備註
<p>楚辭體</p> <p>兩漢體</p> <p>三國六朝體</p>	<p>屈原</p> <p>荀宋 卿玉</p> <p>賈誼</p> <p>司馬相如</p> <p>班婕妤</p> <p>楊雄</p> <p>班固</p> <p>王衡</p> <p>王粲</p>	<p>《離騷》</p> <p>《九章》</p> <p>《遠遊》</p> <p>《漁父》</p> <p>《九辯》</p> <p>《禮賦》</p> <p>《知賦》</p> <p>《雲賦》</p> <p>《蠶賦》</p> <p>《箴賦》</p> <p>（十二篇二十八首）</p> <p>《吊屈原賦》</p> <p>《鵬賦》</p> <p>《子虛賦》</p> <p>《上林賦》</p> <p>《長門賦》</p> <p>《自悼賦》</p> <p>《自素賦》</p> <p>《甘泉賦》</p> <p>《揚雄賦》</p> <p>《河東賦》</p> <p>《羽獵賦》</p> <p>《長楊賦》</p> <p>《西都賦》</p> <p>《東都賦》</p> <p>《鸚鵡賦》</p> <p>（凡十四篇）</p> <p>《登樓賦》</p>	<p>不錄《國殤》和《禮魂》。</p>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宋 體	唐 體
蘇轍 蘇軾 歐陽修 宋祈 杜牧 柳宗元 韓愈	李賀 駱賓王 庾信 江淹 鮑照 謝莊 顏延之 孫綽 成公綏 潘岳 張華 陸機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國立故宮博物院</h1> <h2 style="text-align: center;">NATIONAL PALACE MUSEUM</h2>	
〈黃樓賦〉 〈屈原廟賦〉 〈後赤壁賦〉 〈前赤壁賦〉 〈屈原廟賦〉 〈秋聲賦〉 〈圓丘賦〉 〈凡十三篇〉 〈阿房宮賦〉 〈夢歸賦〉 〈閔生賦〉 〈別知賦〉 〈閔己賦〉 〈劍閣賦〉 〈悲清秋賦〉 〈愁陽春賦〉 〈惜餘春賦〉 〈大獵賦〉 〈明堂賦〉 〈大鵬賦〉 〈螢火賦〉 〈凡十六篇〉	〈枯樹賦〉 〈別鵝賦〉 〈野鶴賦〉 〈舞鶴賦〉 〈蕪城賦〉 〈月賦〉 〈雪賦〉 〈楮白馬賦〉 〈遊天台山賦〉 〈嘯興賦〉 〈秋田賦〉 〈鶴田賦〉 〈鶴田賦〉 〈嘆逝賦〉 〈文賦〉
〈四庫〉本闕篇目。	

蘇叔黨 黃庭堅 秦觀 張耒 洪舜俞	
物院 MUSEUM	物院 MUSEUM
(超然臺賦) (颶風賦) (悼往賦) (黃樓賦) (湯泉賦) (病暑賦) (大禮慶成賦) (老圃賦) (凡十五篇)	(四庫)本闕篇目。 (四庫)本目闕作者姓名，併入張耒名下。

入選的辭賦，誠如祝堯自序所說「載常所誦者」，都是習見的作品，具代表意義；例如〈昭明文選〉「京都賦」選載了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南都賦〉以及左思的〈三都賦〉，祝堯只取班固的〈兩都賦〉。因而，選本體現了文體的典型，讀者就這批精挑細選的作品，透過選者的論述和批評，從而直接把握每一時期的辭賦大體。這種史、論、評相結合的架構，源自西晉摯虞〈文章流別集〉所啟創的批評模式【註二十二】；選文同時反映了選家的文論觀點。例如祝堯摒除曹植的作品，於建安作家群中，獨取王粲的〈登樓賦〉；「三國六朝體」序論之中透露箇中因由：

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歸來子曰：「仲宣〈登樓〉之作，去楚〈騷〉遠，又不及漢，然猶過曹植、陸機、潘岳衆作，魏之賦極此矣！」是以其〈登樓〉一賦不專為辭人之辭，而猶有得於詩人之情，以為風、比、興等義。【註二十三】

選錄王粲的〈登樓賦〉，是以此篇尚存「古風」，並引晁補之（歸來子）的批評佐說。在辭賦史上甚負盛名曹植，竟沒有一篇作品入格，而地位較次的陸機和潘岳的作品尚可入選，祝堯沒有交代緣由，但在朱熹〈楚辭後語〉裡尋得端倪：

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而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註二十四】

〈洛神賦〉是曹植的代表作，朱熹判定為「禮法之罪人」，謹恪於朱學的祝堯，自然不錄曹植的辭賦了。深藏於祝堯的精神世界中的理學家的道德判斷，實支配著去取的權衡。

選文的數量，楚辭體十二篇，兩漢體十四篇，三國六朝體十六篇，唐體十三篇，宋體十五篇，頗為平均，未有因為不滿後來體格而致愈近愈少的情況出現。例如三國六朝體部份，祝堯早已說過：

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為古，已非魏、晉以還所及。【註二十五】

但此體仍佔十六篇，為各體之冠。主要的原因，是這個時期的作品題材比較豐富，為了全面顯現流變的面貌，多選一些是必須的。祝堯自序謂「因時代之高下而論其述作之不同」【註二十六】，論述時勢和創作態度的關係，顯露客觀真象，令讀者透過具體的作品研閱而把握體要，自不能因噎廢食。因此，祝書雖宗歸楚漢賦體，亦甄錄歷代佳篇，以著具備。例如祝堯抨擊陸機《文賦》片言警策、體物瀏亮和貴妍尚巧的主張【註二十七】，依然采錄入集，於「三國六朝體」序論謂：

觀士衡輩《文賦》等作全用俳體，蓋自《楚騷》「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等句，便已似俳，然猶一句中自作對。及相如「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等語，始分兩句作對，其俳益甚。【註二十八】

《文賦》通篇俳體，是古體和俳體的分水嶺，於賦史上有關鍵的意義；為了顯示賦體流變，便不能以意去取了。《文賦》得入選，是反映「變」的事實。祝書宗旨，在抉示大體，很重視抒情的古體賦，因而選錄了陸機的《嘆逝賦》。序論謂「雖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猶得古詩之餘情」【註二十九】；這是真情流露之作，雖哀極失中，但感人至深，亦屬「變風」之類【註三十】。祝堯論賦，以情深怛惻為歸，大體所存，即在於此。甄錄篇章，評品優劣，折中於「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精神，正變論實深融於去取之間。

《古賦辯體》的後一部份是「外錄」二卷，收錄了淵源於賦體的各種文體：「後騷」、「辭」、「文」、「操」、「歌」五體，凡三十一人共四十七首的「有韻之文」；敘述體例和前八卷相同，序論、解題和作者介紹一應具備，絕非簡末閑綴。選文的準則，據祝堯自序，是「以歷代祖述楚語者為本，而旁及他有賦之義者，因附益於辯體之後，以為外錄」【註三十一】。這種附麗於卷末的安排，乃為反映賦體的流別，以「曲暢旁通」的識力審視賦體的衍變；祝堯於外錄的總序說：

賦體之流，固當辯其異；賦體之源，又當辯其同。異同兩辯，則其義始盡，其體始明，此古賦外錄之辯，所以繼於《古賦辯體》之辯也歟！【註三十二】

辨察源流正變，是貫串全書的基本精神。有關外錄的著錄情況，下表詳示。

體	作者	作品	備註
後 騷	宋玉	〈招魂〉 〈惜時命〉 〈哀時命〉 〈招隱士〉 〈反風騷〉 〈訟風伯〉 〈享羅池〉 〈寄蔡氏女〉 〈毀壁〉 〈秋風三疊寄奉秦少游〉 〈凡十篇〉 〈秋風辭〉 〈絕命辭〉 〈歸去來辭〉 〈濂溪辭〉 〈延陵懷古辭〉 〈凡五篇〉 〈北山移文〉 〈吊古戰場文〉 〈弔田橫文〉 〈弔屈原文〉 〈弔荻弘文〉 〈弔樂毅文〉 〈凡六篇〉 〈履霜操〉 〈雉朝飛操〉 〈將歸操〉 〈龜山操〉 〈拘幽操〉 〈殘刑操〉 〈胡笳〉 〈凡七篇〉 〈南風歌〉 〈麥秀歌〉	〈四庫〉本誤作「晁氏」。 〈四庫〉本序目誤書為「二疊」，並闕「寄奉秦少游」五字。 包括「延陵季子」、「蘭陵令」、「東坡先生」三首。
歌	蔡琰	〈胡笳〉 〈凡七篇〉 〈南風歌〉 〈麥秀歌〉	
文	孔稚圭 李華 韓愈 柳宗元	〈北山移文〉 〈吊古戰場文〉 〈弔田橫文〉 〈弔屈原文〉 〈弔荻弘文〉 〈弔樂毅文〉	
操	尹吉甫 韓愈	〈履霜操〉 〈雉朝飛操〉 〈將歸操〉 〈龜山操〉 〈拘幽操〉 〈殘刑操〉	

伯夷 孔子 楚狂 楚陶 寡陶 楚漁 榜樵 荆越 項羽 劉邦 漢武 烏孫 李鴻 韓愈	伯夷 孔子 楚狂 楚陶 寡陶 楚漁 榜樵 荆越 項羽 劉邦 漢武 烏孫 李鴻 韓愈
(采薇歌) (獲麟歌) (鳳兮歌) (黃鵠歌) (渡伍員歌) (越人歌) (易水歌) (垓下帳中歌) (大風歌) (瓠子歌) (烏孫公主歌) (五噫歌) (鳴皋歌) (盤谷歌) (凡十六篇)	(采薇歌) (獲麟歌) (鳳兮歌) (黃鵠歌) (渡伍員歌) (越人歌) (易水歌) (垓下帳中歌) (大風歌) (瓠子歌) (烏孫公主歌) (五噫歌) (鳴皋歌) (盤谷歌) (凡十六篇)

以上五體都是衍生於《楚辭》的賦體別支；「後騷」一名裁變於晁補之的《變離騷》，「辭」、「文」、「操」、「歌」隱括於元稹《樂府古題序》，精簡元稹「二十四名」的說法【註三十三】。此二卷的「外錄」以「後騷」先導，宋玉的《招魂》和《惜逝》置諸卷首，以示別支的宗源，亦肇始於《楚辭》【註三十四】，和「祖《騷》而宗漢」的主張是貫徹一致的。宋人晁補之有《續離騷》和《變離騷》兩部總集以揭示《楚辭》衣披後世的餘響，二書雖佚，但朱熹《楚辭集注》「續離騷」三卷和《楚辭後語》便是據晁書損益而成，尚足見其大體。祝書「外錄」就體例來說，實誘導於晁、朱的楚辭學【註三十五】。朱子書但編列作品，而祝書詳別為五大類，眉目清晰，脈絡分明；選文大抵出朱子書，祝書補充十多篇【註三十六】。可以說《古賦辯體》的編纂誘導於晁、朱的楚辭學，而作為明、清兩代賦論的原始，這一過渡和轉移實堪重視。楊雄早說過「賦莫深於《離騷》」【註三十七】，劉勰亦謂賦「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註三十八】，視《楚辭》為賦的先導，本已是由來已久的認識，《楚辭》與賦相提並論，原非創論；但以總集的形式呈現《楚辭》與賦的承遞關係，並由此而建立一套批評的標準和寫作導向，則《古賦辯體》是成功的嘗試了。

註釋

- 【註一】：紀昀於《四庫提要》盛稱《古賦辨體》，謂其「采摭頗為完備」以及「於正變源流，亦言之最確」，力辨何焯的非難。
- 【註二】：《江西通志》卷廿四。台北：華文書局影印光緒七年刊本，一九六七年。頁五三二。
- 【註三】：《無錫金匱縣志》卷十五。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光緒七年刊本。頁二二八。
- 【註四】：《廣信府志》卷九。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同治十二年刊本。頁七三二。
- 【註五】：《元史》卷八十一《選舉志》。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洪武本。頁九九六。
- 【註六】：《廣信府志》卷十一，頁一三七八。
- 【註七】：同注五。
- 【註八】：見《宋元學案》卷七十八「張祝諸儒學案」之祝泌傳後王梓材《考略》。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頁二六二零。
- 【註九】：《廣信府志·序》，頁一。
- 【註十】：《古賦辨體》卷七「唐體」序。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三。後引《古賦辨體》俱用此本。案：今可知刊本，有明嘉靖十一年刻本，九行二十小字雙行，民初李一氓先生跋，今藏北京圖書館。又明嘉靖十六年刻本，十行十八字，有清許琅的批校，藏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近人徐志嘯《歷代賦論輯要》撮錄，小注「明成化刻本」，更早於北京圖書館所藏本。然上述三種明本，均未得寓目，遺憾之至。今所用《四庫全書》鈔本，流行較廣；取便查覆，惟用此本。
- 【註十一】：《古賦辨體》卷七「唐體」序，頁一。
- 【註十二】：同右註十一。
- 【註十三】：《古賦辨體》卷八「宋體」序，頁四。
- 【註十四】：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載《廿五史補編》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頁八四三六。
- 【註十五】：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十一。台北：廣文書局影印適園叢書本，一九六七年。頁二一五九。
- 【註十六】：《宋史·藝文志》。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元至正刊本。頁二四六一。
- 【註十七】：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六四二。
- 【註十八】：《古賦辨體》卷一，頁一。
- 【註十九】：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二十三。

【註二〇】：〈古賦辨體〉卷一，頁一。

【註二一】：葉幼明〈辭賦通論〉謂「32家91首」，至宋張文潛而止。（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一五七），葉氏為目錄疏漏所蔽。宋體以洪舜俞〈老圃賦〉輟末，惟目錄漏名兼且並歸入張耒名下。葉氏未明言所據本，然〈四庫〉本則如是。

【註二二】：楊明照：〈從〈文心雕龍〉看中國古代文論史、論、評結合的民族特色〉，載華東師範大學研究所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方法論集〉。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七年。頁四十二。並參考拙著〈摯虞研究〉第十二章。香港：學衡出版社，一九九零年。頁一八二至一九六。

【註二三】：〈古賦辨體〉卷五，頁二。

【註二四】：朱熹：〈楚辭集注·後語·序〉。香港：中華書局影印宋端平本，一九七二年。頁四。案：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梓印是本，缺漏此至關重要的目錄及序。

【註二五】：〈古賦辨體〉卷三，頁四。

【註二六】：〈古賦辨體〉目錄序，頁一。

【註二七】：祝堯批評陸機〈文賦〉的觀點，見卷五陸機〈文賦〉題下評語，頁六。

【註二八】：〈古賦辨體〉卷五，頁三。

【註二九】：同上，頁四。

【註三〇】：見〈辨體〉卷五〈歎逝賦〉題下評語，頁十。

【註三一】：〈古賦辨體〉卷九，頁四。

【註三二】：同上，頁二。

【註三三】：見〈辨體〉卷九序，頁一。

【註三四】：〈辨體〉卷九「後騷」序謂「〈騷〉為賦祖，雖或信之，賦終非〈騷〉，亦或疑之矣。故先以屈、宋之〈騷〉，載為正賦之祖；而別以後來之〈騷〉，錄為他文之冠。有源有委，而因委知源；有祖有述，而因述知祖，則古賦之體或先或後，同源並祖，於此乎辨之，其可也。」（頁五）

【註三五】：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謂：「迨元祝氏輯纂〈古賦辨體〉，其曰「後騷」者，雖文辭增損不同，然大意則亦本乎晦翁之舊也。」（頁二十一）

【註三六】：祝堯所補十四篇如下：黃庭堅〈濂溪辭〉、楊萬里〈延陵懷古辭〉、孔稚圭〈北山移文〉、尹吉甫〈履霜操〉、牧犢子〈雉朝飛操〉、舜〈南風歌〉、箕子〈麥秀歌〉、伯夷〈采薇歌〉、孔子〈獲麟歌〉、楚狂接輿〈鳳兮歌〉、寡陶嬰〈黃鵠歌〉、楚漁父〈渡伍員歌〉、韓愈〈盤谷歌〉（此截取〈送李愿歸盤谷序〉的歌）。

- 【註三七】：〈漢書〉卷八十七（下）〈楊雄傳贊〉載述雄語：「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頁三五八三。）晉代摯虞〈文章流別集〉亦引雄語以標舉〈離騷〉的賦宗地位，語見〈太平御覽〉卷五八七（參拙著〈摯虞研究〉，頁一八六）。
- 【註三八】：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卷二〈詮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零年。頁四十九。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he Discussions on Fu in Chu Yao's

Ku-fu Pien-ti

Teng Kuo-kuang

University of Macau

Abstract

In terms of style and structure, the Chinese **tz'u fu** had developed into a full-blown literary genre by the Sung(960-1279)and Yuan(1260-1368)dynasties. The re-emergence of civil-service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Yen-yu reign(1314-1321)of the Yüan period even mad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is particular form of prose poetry a must in the intellectual arsenal of budding literati seeking appointments to official posts. Further, as tz'u fu compositions of mixed qualities abounded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the time, the need fo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xisting works had never been more obvious. It wa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Yüan scholar Chu Yao (n. d.) compiled the *Ku-fu Pien-ti*, an anthology of ten volumes of 129 tz'u fu pieces by 61 author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403-221 B. C.)to the Sung. Arranged in a chronological order, the main body of the compilation provides in eight volumes extensive coverage of classics in the *Ch'u-tz'u* and works from the Han (202 B. C. -A. D. 220), the Three Kingdoms(220-265)and the Six Dynasties(220-589), the T'ang(618-907), and the Sung epochs. Compositions in the variant forms of these styles, on the other hand, are presented in the two supplementary volumes. It is worth noting, though, that the intent of the *Ku-fu Pien-ti* is by no means confined to offering a collection of essential pieces; its scope, to be sure, is of a broader type, as the compiler himself had rendered where possibl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remarks in the critical vein. When adopting the approach of juxtaposing the original pieces and the critiques in one single collection, Chu Yao had apparently embraced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the *Wen-chang Liu-pieh-chi* of Chih Yu (d. 331)and the philosophies underlying the *Ch'u-tz'u* studies of Ch'ao Pu-chih(1053-1110)and Chu Hsi(1130-1200). By examining representative compositions through the ages from four distinctive perspectives, Chu Yao was able to recapitul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poetic genre of tz'u fu and to substantiate the claim that the predominant mode of exposition had

* The author's summary was translated by Chao-ling Sung.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s 一一九 through 一三二.

been one that was short and expressive of lamentable sorrows or emotional states. A rare and outstanding literary study with a carefully constructe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Chu Yao's review and critical analysis had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undertakings of an identical nature during the Ming(1368-1644)and Ch'ing(1644-1912)dynasties.

Keywords: Chu yao 祝堯

Ku-fu Pien-ti 古賦辯體

Fu 賦

Tz'u-fu 辭賦

Wen-chang Lia-pieh-chi 文章流別集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